

# 論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 共黨角色——蘇東劇變的反思

趙春山

政大東亞所教授

## 摘 要

在蘇聯與東歐劇變之後，中共擔心會有「亡黨亡國」的危機，再度強調「黨建」工作的重要性。爲了建立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中共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並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力，得到了合理化的解釋。

但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共與前蘇聯一樣，面對來自內外環境的各項挑戰，並使共黨的角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爲了因應內外挑戰，中共採取了四項應變的措施，目的是維持共黨專政的地位。

到目前爲止，中共並未步上前蘇聯的後塵，產生分崩離析的現象。探究其因，關鍵在於內部建立「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因此，觀察今後共黨角色的變化，亦應從中共是否處理好改革、穩定、發展三者間的關係，作爲切入點。

關鍵詞：蘇東劇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集中制、以法治國、集體領導、和平演變

## 壹、導 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中共爲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所舉行的大會上，發表了一篇重要

意志與自由  
加強政治思想教育  
推動政法工作  
調整對外關係

的講話。江澤民在講話中，把中共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經驗，概括為十一個方面，其中涉及共黨角色的部分，江澤民表示：

「必須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事業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要把十幾億人的思想和力量統一和凝聚起來，共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設想的。二十年來的實踐告訴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必須認真研究自身建設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善於學習和提高，善於改進和加強領導。要堅持黨要管黨和從嚴治黨，用改革的精神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始終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並體現時代要求。這樣才能不斷提高黨的執政和領導水平，不斷增強黨的戰鬥力和拒腐防變的能力。」<sup>1</sup>

「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一向被認為是中共獲取政權的「三大法寶」。江的談話顯示，在中國大陸進入現代化的階段，中共仍舊強調「黨建」的重要性；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人也認識到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已經改變了中國大陸的內外環境，共黨必須自我調整其角色，來面對各種新的挑戰。因為，「在當今中國還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sup>2</sup>的時刻，共黨能否成功地應付新的挑戰，已經不是改革開放政策是否得以順利推行的問題，它已嚴重到攸關中共「亡黨亡國」的前途問題。「蘇東劇變」在這方面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所謂「蘇東劇變」，這是從一九八九年開始的變化，照中國大陸學者劉吉等人的說法，「在改革的難關面前，蘇聯及東歐的九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了演變，改掉了共產黨的領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雖然劇變的方式呈現了不同的類型，但劉吉等學者認為：「根本問題出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因為，這些垮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生劇變以前，都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在這種體制下，執政黨的手中擁有無限的權力。也正因為如此，共產黨的狀況也就直接決定著黨的命運、國家

<sup>1</sup>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19日，第2版。

<sup>2</sup> 同上。

的命運和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命運。」<sup>3</sup>

中共黨然關心它的命運問題，在蘇東劇變之後，中共內部即廣泛地探討劇變對中國大陸可能產生的影響。大陸學者董耀鵬等把劇變帶給中共的啓示，簡單地歸納為「五個堅持」和「五個決不能」，此即：「堅持黨的領導，決不能搞多黨制；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決不能搞西方的議會政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決不能搞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堅持公有制的地位，決不能搞私有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不能搞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sup>4</sup>其中，堅持共黨領導權，鞏固執政地位，使黨「經得起改革開放、商品經濟、執政地位和反和平演變鬥爭的綜合考驗」，被置於首要的任務。因為，「這對中國人民的未來有著決性的意義，但東歐、蘇聯各國黨恰恰在這個大問題上犯了錯誤。」<sup>5</sup>

中共如何面對考驗，避免犯錯，是本文探討的重點。在此我們應先強調，在探討的過程中，我們已注意到中國大陸與蘇聯、東歐，在主客觀環境上存在的差異性，因此，蘇聯與東歐發生的變化，並不必然會反應在中國大陸內部。此外，我們也理解中共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用心，意圖走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但歷史的發展畢竟存有太多的巧合，在蘇東劇變之後，當我們檢視中共的改革理論和改革過程中面對的諸多問題時，仍不時出現「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是本文加上「蘇東劇變的反思」這一副標題的原因，也是中共不斷強調要記取教訓的理由。

## 貳、中共改革理論與共黨權力的合理化

共產黨人常常引用列寧「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這句話，來說明理論與行動的相互關係。專研共黨問題的美國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認為，意識形態在當代政治中的重要性，主要和知識的普及，社會經濟的加速變動，以及民眾對於政治注意力的增加

<sup>3</sup> 按照劉吉等人的說法，蘇東劇變可歸納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人民起來用暴力推翻了共產黨的領導，如羅馬尼亞；第二類是人民群眾支持協助反對派發難，迫使共黨與其聯合執政或讓出政權，如波蘭等國；第三類是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前途表示冷漠，對政治上的派別紛爭、政權更替，乃至共黨交權下台、宣佈放棄社會主義等一切都漠然處之，這是最普遍的現象。以上見劉吉主編，*社會主義改革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頁17。

<sup>4</sup> 黃耀鵬、胡克、白廣元編著，*兩種制度的生死較量—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頁202。

<sup>5</sup> 同上，頁200-201。

有關，這些因素使得政治成爲眾人關切的事務。爲了有別於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布里辛斯基把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形容爲一種「現代的革命意識形態」(modern revolutionary ideology)，它基本上是屬於一套行動綱領，這套綱領是源自一些針對現實事務特質所作的假定，並且透過對過去和目前社會情況的缺失所作的明確主張來加以表達。<sup>6</sup>

在共黨革命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和權力兩者間的關係，確實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課題。布里辛斯基強調，當意識形態被用來提高士氣或鼓舞信念時，它在許多方面是代表了權力的固有傾向。意識形態爲權力的運用塑造目標，並且決定權力使用的方向。有時候，意識形態可以幫助權力的合理化和理性化；並且在權力轉化爲權威的同時，意識形態本身變成了權力的一部分。<sup>7</sup>

中共政權成立以後，有關意識形態的路線之爭，始終伴隨著權力鬥爭而不斷地進行。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所謂強硬派和務實派之間的論辯，基本上也是集中在下列中共領導人所面對的三個意識形態問題：第一、從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開始引進資本主義的機制後，中共似乎有必要對它的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一個合理化或合法性的解釋；第二、中共這種採用資本主義機制而仍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說法和作法，究竟能維持多久；第三、中共已面臨了一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一方面又要避免受到資產階級腐化趨勢所影響的矛盾問題。<sup>8</sup>爲了解決上述三個彼此相互關聯的意識形態問題，建立改革開放的理論架構，誠然有其絕對的必要性。

####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依照「中國共產黨大辭典」的解釋，中共認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有下列兩項意義：第一、中國的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故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故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具體而言，這個階段具有下列的特點：

<sup>6</sup>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485-486.

<sup>7</sup> *Ibid.*, p. 488.

<sup>8</sup> James C. F. Wa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1995), pp. 55-56.

(1)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的情況下，堅持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共同發展；

(2)剝削制度已經消滅，但還存在著零星的雇佣勞動關係；

(3)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

(4)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5)工農、城鄉、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已消除，但仍然存在著差別；

(6)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已有相黨基礎，但還很薄弱；

(7)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但發展水平和生產社會化程度還不夠高，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還不夠強大。

根據這些特點，中共認為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資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解決矛盾的主要方法即是發展生產力，以擺脫貧窮和落後。<sup>9</sup>

中共認為，馬克思並沒有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具體的階段劃分，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有關。根據中國大陸學者的特法：

「各社會主義國家在建國初期普遍立了過分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在戰爭環境中，在國家工業化時期，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在擺脫戰爭環境和實現國家工業化以後，這種體制的弊端就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但長期以來，人們並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是可以而且應當不同的；相反，認為可以從這種忽視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的體制直接過渡到要求消滅商品貨幣關係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因而犯了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錯誤。」<sup>10</sup>

在中共的眼中，前蘇聯共黨領導人赫魯曉夫（N.S. Khrushchev）在執政時提出的共產主義「全面建設論」，即代表了他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的思想。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關於總結報告的決議中提出：要「在歷史最短時期內」，「在按人口計算的產量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大會上的報告

<sup>9</sup>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5月），頁377-378。

<sup>10</sup> 薛漢偉，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劃分的理論和實踐（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頁2。

中，赫魯曉夫又把這個「最短時間」具體規定為十五年；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七日，在蘇共二十一大的報告中，赫則正式宣布：「蘇聯進入一個新的、極重要的時期——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把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發展到極端，宣布「在二十年內我們將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sup>11</sup>

一般認為，赫魯曉夫這種近乎盲目的樂觀主義想法，是導致他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繼任者布里茲涅夫（L.I. Brezhnev）於一九六七年，在一項「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五十年」的報告中，首次提出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論斷。中共學者認為這個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劃分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內容：

第一、否定了過渡時期的結束就意味著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觀點，開始強調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性；

第二、重新提出了社會主義階段劃分問題；

第三、提出了社會主義有其自身基礎的論點；

第四、提出了在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建立無產階級社會的設想。<sup>12</sup>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提出，相當部分是參考了蘇聯過去的發展經驗。至於為什麼會有「初級」和「發達」的不同。中共學者提醒我們，看初級階段的概念必須同中共社會主義制度尚不完善的提法聯系在一起；也應同中國大陸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和改變這種落後狀況需要經過長期努力的估計聯系在一起。<sup>13</sup>

基於上述兩項估計，中共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這個階段的根本任務。馬克思雖然沒有對社會主義階段的劃分作出貢獻，但其歷史唯物主義，卻提供了中共強調發展生產力的思維方向。中共學者強調：「歷史唯物主義把一切社會關係歸結於生產關係，把生產關係歸結於生產力發展的高度，從而使人們有可靠的根據去分析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sup>14</sup>

## 二、共黨發揮的功能

有關「國家消亡」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探討國家性質的一個重點。列寧曾在「國家與革命」的論述中如此表示：

<sup>11</sup> 同上，頁 110、113。

<sup>12</sup> 同上，頁 119-122。

<sup>13</sup> 同上，頁 177-179。

<sup>14</sup> 同上，頁 193。

「其實，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底國家，而他關於『消亡』的語句，則是指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無產階級國家制度底殘餘而言。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自行消亡』，而是要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把它『消滅』。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則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了。」<sup>15</sup>

實際的情況是，擁有權力者是不會輕易放棄權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證明，不僅共黨國家沒有「自行消亡」的意思，連扮演無產階級先鋒隊角色的共產黨本身，也無意放棄其專政的權力。在中共的眼中，前蘇聯共黨領袖戈巴契夫（M.S. Gorbachev）的改革，是一種「自廢武功」的作法。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他的理念和行爲，我們會發現戈巴契夫的革命和一般政府和宮廷政變的形態不同，它不是要改變蘇聯的權力，或是放棄其基本原則，而是要「強化社會主義，並使其更具活動和政治意義。」<sup>16</sup>換言之，戈巴契夫並無放棄權力的打算。蘇聯最後走向「自行消亡」，有其客觀存在的複雜因素。

中共當然也沒有「自行消亡」的打算。相反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爲維持共黨的統治權力，找到一個合法性的基礎。作爲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曾明白指出：「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黨的領導，艱苦創業的精神就提倡不起來；沒有黨的領導，真正又紅又專、特別是有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隊伍也建立不起來。這樣，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祖國的統一、反霸權主義的鬥爭，也就沒有一個力量能夠領導進行。」<sup>17</sup>

由於中共的改革是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序幕的，因此中國共產黨遂被視爲「改革事業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一名中國大陸的學者，對於共黨角色的重要性，作了以下的描述：

<sup>15</sup>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文選（第二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1949年），頁175。

<sup>16</sup> M. Gorbachev, *Perestroika i Novoe Myshlenie: Dlya Nashei Strany i dlya Vsevo Mira* (Moskva: Izdatelstvo Politcheskoi Literatury, 1987), p. 51.

<sup>17</sup> 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頁266。

「改革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事業，它所面臨的形勢是極其複雜的，它的任務是極其艱巨的。改革勢必引起經濟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這種調整，將牽動中央、地方、企業、職工以及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這些形形色色的利益主體。在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就必然形成一種權力真空，出現社會生產的純粹無政府狀態，出現八百諸侯各行其是的局面，一切絕跡了的腐朽事物，也將會死灰復燃。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就會由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變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否定，就會由歷史的前進變成歷史的倒退。這樣，一切善良的人們所真心渴望的新的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就不可能真正有序地實現。」<sup>18</sup>

上述中國大陸學者的看法，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其中屬於文盲和半文盲的，占有的比例也不算少。因此，共黨扮演的角色，自然非比尋常。更重要的是，中共長期維持一黨專政，共黨組織掌握社會的最大資源，控制人才和資訊的流動。在缺乏共黨領導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想像任何政策的推動和執行，能夠付諸實施。改革既然有其必要性，改革涉及的問題又是如此廣泛、如此複雜，共黨不僅從改革過程中找到合理存在的藉口，並且也找到擴充職能的理由。共黨顯然沒有隨著社會發展而產生「自行消亡」的意向。

### 叁、共黨面臨的挑戰

中共理論家劉吉認為，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改革存在著兩大阻力：一是屬於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就是「人民內部各種利益格局、利益關係的調整和組合而引出的各種不同觀念的碰撞和摩擦。」；另一方面是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大力的搗亂。」<sup>19</sup>對於扮演改革事業「發動者」和「領導者」角色的共黨而言，這些阻力實際上就是構成了挑戰。而如何應付挑戰，則不僅攸關改革的能否順利推行，也影響共黨的權力和地位。在此，我們把共黨面臨的挑戰，歸納為內在和外在兩個部分。

<sup>18</sup> 馬慶泉，*中國改革的理論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頁241。

<sup>19</sup>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頁364。



### 一、內在的挑戰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所推動的改革方案，內容非常廣泛，具有全局性的意義；影響所及，其產生的問題，也含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和對外關係等各個層面。一九九五年九月廿八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的閉幕式中，發表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講話。江澤民在講話中列舉的「重大關係」，包括了：第一、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第二、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第三、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第四、第一、二、三產業的關係；第五、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第六、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第七、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份的關係；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係；第九，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係；第十，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十一，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第十二，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sup>20</sup>

以中共的術語來說，江澤民提出的「十二大關係」，就是十二個重大問題，也可解釋為改革開放後，中共面對的十二項矛盾。由於共黨在改革過程中起的作用，江提出的十二大關係，已構成了共黨的嚴重挑戰。劉吉認為，執政共黨本身在改革中發生的變化，也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問題，這是本文關切的重點。

劉吉提出的問題是中央權威的削弱和基層黨組織的渙散。前者表現在法規政策不能得到遵從，中央說話不能夠「算數」或不能夠完全「算數」；後者則是基層黨組織不能起到領導和帶頭的作用。尤其是在農村，黨和政府與村民的距離拉大，行政效力減弱。<sup>21</sup>

劉吉的說法，也就是江澤民在「十二大關係」中提到的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江澤民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實行權力下放，地方積極性得到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改革和發展。這是一條重要經驗，應當充分加以肯定。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有的地方和部門過多地考慮本地區、本部門的局部利益，貫徹執行中央的方針和政策不力，甚至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sup>22</sup>

20 江澤民演講第二部分，全文引自翁杰明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1-17。

21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頁377。

22 翁杰明，*與總書記談心*，頁14。

對於像中國大陸這樣擁有廣大幅員的國家而言，如何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確實是執政者面臨的一項重大考驗。中國大陸學者在探討蘇聯興亡的過程時，就已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認為蘇聯從三〇年代開始，聯盟中央權力就一直無休止地膨脹，使蘇聯實際上逐漸成為單一制的國家。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有名無實，它們只有聽命於中央，而逐漸失去自身發展的活力。最後導致地方與中央之間權力和利益的矛盾和衝突。<sup>23</sup> 史大林以後的蘇聯領導人，其改革的重點之一即是採取權力下放的措施。結果卻又產生了中央權威削弱的後遺症。以赫魯曉夫為例，他旨在擴大加盟共和國經濟權限的改革是有積極的意義，「但由於事先缺乏周密的思考和充分準備，忽視聯盟中央必要的集中，結果，權力下放以後就造成了中央對經濟失控，地方主義、分散主義泛濫，國民經濟出現了混亂。」<sup>24</sup>

一般認為，民族問題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但探討蘇聯多民族國家的性質時，我們無法忽視中央與地方關係失調所起的催化作用。實際上，研究政治發展理論的學者，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提出「政策貫徹」(Policy-Penetration)的概念，即政府在推動政令時，如何將之貫徹到社會的最下層，以及國境內最偏僻的角落。如果政府未能解決此一課題，則整個體系會遭受很大的緊張壓力。即一般所稱的「危機」(Crisis)。當政府面臨「政策貫徹」危機的時候，或多或少也會涉及其他諸如「自我認同」、「正統合法」、「政治參與」、「資源管理和分配」，以及「國家整合」等危機。<sup>25</sup> 這些「危機」的概念，可以提供我們分析蘇聯由盛而衰的理論架構。

除了上述劉吉提到的中央權威削弱和基層組織渙散外，我們認為共黨面臨的另一內在挑戰是黨的腐化問題。所謂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則導致絕對的腐化。前蘇聯共黨在蘇聯政治體制中，長期掌握權力，故腐化的現象即從蘇共開始。一九八〇年代初，當時流亡美國的俄裔學者席米斯(Konstantin M. Simis)，曾根據他親身的體驗，寫了一本名為「蘇聯：腐化的社會」(USSR: The Corrupt Society)專書。席米斯在書中描述蘇聯社會腐化的精彩片斷是：「工人以伏特加酒賄賂領班，目的是得到好的工作；政治局的候補委員收受鉅款，用來保護地下富豪；阻街女郎只要付給警察十個盧布，就可當街拉客；前文化部長以公款興建華麗的鄉村別墅。

23 張偉恆等主編，*蘇聯興亡和社會主義前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1月），頁241。

24 同上，頁247-248。

25 參考江炳倫編著，*政治學論叢*（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民國65年10月），頁4-5。

總之，每一個人都受制於腐化。」<sup>26</sup> 在安德洛波夫（I.V. Andropov）擔任總書記時，有心解決蘇聯共黨的腐化問題，故強調秩序如紀律的重要性。可惜他當政的時間很短，腐化成了繼任者無法解決的痼疾。

中共似乎也難以脫離共黨專政下的這個宿命論。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中，曾有如下的敘述：

「在改革開放中，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價值觀、人生觀，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會滋生出來或從境外流入進來。這種環境與過去沒有改革開放的環境相比，黨的隊伍面臨被腐蝕的危險大大增加了。尤其是現在我們尚未完全確立起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新秩序，有些經濟運行機制和調控手段還比較混亂，制度不夠健全，法制不夠完備，出現了一些空子，給那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造成了以權謀私的機會，就更加大了黨的隊伍被腐蝕的危險。能不能克服腐敗現象，增強黨員對腐敗現象的免疫力和抵制力，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能不能使黨員在改革開放中正確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係；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關係；能不能使黨員既模範地執行現行政策，又堅持黨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員標準，既在經濟領域重視和運用價值規律、講等價交換，又決不把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從而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我們黨面臨著嚴峻的考驗。」<sup>27</sup>

令中共感到憂慮的是，黨的腐敗現象不是擁有最大權力的上層所專有，而是出現在一些基層組織。劉吉認為，「現在許多腐敗現象恰是一些基層組織默許或者甚至帶頭進行的。如一些鄉鎮企業（現在恐怕國營大中企業也有了）對政府工作人員行賄是在黨委書記親自帶隊下進行的呢！是共產黨對共產黨行賄，共產黨向共產黨打糖衣炮彈，這一點是與當年『三反』、『五反』大不相同了。這才是真正令人堪憂的腐敗！」<sup>28</sup>

## 二、外在的挑戰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後，有些西方人士確實認為中共會尾隨之後，

<sup>26</sup> Konstantin M. Simis, *USSR: The Corrupt Socie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p. 297.

<sup>27</sup> 王維澄、白克明等編著，*光輝的歷程·偉大的使命——學習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河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7月），頁175-176。

<sup>28</sup> 劉吉，*社會主義改革論*，頁370-371。

成爲共黨世界另一個倒下的骨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即坦承，有些美國人希望中國大陸發生蘇聯式的倒台會產生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從而減低中共構成的威脅。<sup>29</sup> 據說，早在一九九四年八月，美國國防部即進行一項有關中國在未來七年內可能發生何種狀況的研究。該一研究假定，鄧小平去世後並無強人接班。結果，在參與研究的十七位美國企業分析家及教授當中，有將近半數的人相信，中國大陸在過渡期間將導致某種方式的「分裂」，其可能性包括中央在一定時期內不能解決派系傾軋，或出現更大的地方主義，乃至完全解體；相信中共將與一九九四年的情景大同小異者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而西方所希望出現的「自由化改革情勢」，則被認爲是最小可能發生的事。<sup>30</sup>

事實顯示，中國大陸並沒有分崩離析，但上述一些西方的「期望」。卻是北京統治當局難以擺脫的夢魘。這也是中共至今仍在高喊「反和平演變鬥爭」的主要原因。從中共的觀點看，導致蘇東劇變的因素，除了內部環境的變化外，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和平演變戰略，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這項戰略，早在冷戰初期就已開始推動了。根據中共的說法，所謂「和平演變戰略」，顧名思義，「是一種旨在通過政治、經濟、思想等非軍事、非暴力的『和平方式』瓦解和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重新恢復資本主義在全球一統天下的新的戰略圖謀。」<sup>31</sup>

在中共眼中，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推動的和平變戰略，雖以蘇聯和東歐爲重點，但並未因此對中共網開一面。中共表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起，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就採用武裝顛覆與和平演變反革命兩手政策對付中國，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這反革命軟硬兩手，總是同時兼施，交互爲用；不過，隨著鬥爭形勢的變化，在不同時期其側重點亦有所不同。」<sup>32</sup>

中共當然有它憂慮的理由，當中國大陸沒有像若干西方人士所預期的趨於瓦解的命運時，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論調，中共認爲這一論調已使它成爲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潛在頭號敵人。所謂「中國的崛起」，其主要的根據是中共的經濟成長已導致整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

29 Kenneth Lieberthal, "A New China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Nov. / Dec. 1995, p. 37.

30 引自麥杰思著，袁希正譯，鄧小平的遺產·江澤民的困境（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10月），頁347。

31 「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參考資料」編輯部，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頁3。

32 同上，頁52-53。

大陸學者引述蘭德公司和世界銀行的預測稱：「二〇〇五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個經濟大國；二〇一〇或二〇二〇年前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八萬億美元，超過美國而雄踞世界首位。」大陸學者強調，在美國的心目中，中國崛起的趨勢，「必然促使其國際地位和外交行為發生變化和進行較大程度的調整。」<sup>33</sup>從而在兩個層面上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和現存國際秩序構成了挑戰：一是作為後發型現代國家，中共的崛起構成了地緣政治挑戰；二是作為冷戰後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共的快速發展，對美國推廣其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構成了最大的障礙。中共認為，前一矛盾是「中國威脅論」的主要心理依據；後一矛盾，則是美國人權外交的心理根源。<sup>34</sup>

儘管中共強調不作霸權，但中共經濟實力成長後可能產生的軍事擴張傾向，同樣令西方感到憂心。西方學者認為，中共在亞洲追求強權的地位，會導致它和美國的利益衝突，因為，美國的既定亞洲政策目標，即是避免地區內出現任何具有絕對權力的國家。西方學者強調，在今後一、二十年內，中共將不可避免地在其鄰近太平洋地區，追求一個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權力角色。因此，當中共企圖武力犯台，或是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它所聲稱的南中國海領土爭端時，美國與中共兵戎相見的可能性升高，尤其是在中共軍力日增的情況之下為然。<sup>35</sup>

從一九九五年底到九六年初的台海軍事危機，美國採取派艦介入的行動，並與中共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隨後，柯林頓總統與江澤民雖相互進行了高層訪問，並且發展出一套「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但中共對美國的戒懼並未消除。實際上，在筆者走訪中共對外關係智庫，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中共認為美國對中共的戰略目標並沒有改變，仍以推動「和平演變」戰略為最終的目標。

#### 肆、共黨的因應對策

面對來自內外的挑戰，中共採取的因應對策包括下列幾點：第一、以

33 李義虎，「對華遏制將使美國自損——由『江克會略』回顧與前瞻中美關係」，*中國評論*（香港），1998年1月號，頁38-39。

34 金燦榮，「克林頓訪華後中美關係究竟有無實質改善」，*中國評論*，1998年10月號，頁24。

35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March / April 1997, p. 21.

落實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來改善黨的領導，樹立新的權威；第二、加強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三講」教育；第三、以法治國，打擊社會的犯罪活動，特別是整頓共黨的腐敗問題；第四、調整對外關係，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 一、落實民主集中制

研穹究蘇聯歷史的人都會瞭解，史大林當初建立的社會主義體制，其最大的特點是塑造了個人的獨裁統治。領導人權力集中化的傾向，使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形同具文。戈巴契夫上台後，在政治改革方面採取極端的作法，一九九一年七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並公布的蘇共綱領草案，則表明蘇共已完全放棄了民主集中制。因為，新的綱領草案強調：各共和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和黨的基層組織「廣泛自治」；每個黨員的個人主權是「黨內民主的基礎」，任何一個黨組織都不得要求黨員放棄他自己的觀點和信仰或是干涉他的個人生活；允許黨員「圍繞綱領自由結社」，即正式承認黨內派別活動。這種情況，為蘇聯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因此，從蘇聯共黨的慘痛經驗，中共學者得出的教訓是：

「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立並不斷完善各項相關的規章制度，及時克服和糾正各種違背這一原則的錯誤，才能不斷鞏固和發展；忽略民主，只強調集中，甚至搞個人集權固然影響了黨的健康發展，有必要進行及時糾正，但如果借口發揚民主，根本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必然導致黨的瓦解。」<sup>36</sup>

所謂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中共的學者認為：

第一、正確理解和處理民主與集中問題。民主的基本要求是：黨內一切事務均由全體黨員直接或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條件下處理；黨的所有負責人、領導成員和機構均由選舉產生，並且必須向全體黨員報告工作，接受監督並可以撤換；每個黨員都能獨立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集中的基本要求是：黨的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是負責日常領導工作的最高機關，全黨必須有統一的章程，必須遵守鐵的紀律；全黨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決議，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

第二、堅持民主決策，集中執行的原則。也就是決策過程中實行民

<sup>36</sup> 張偉垣，蘇聯興亡和社會主義前景，頁 362-363。

主，執行過程中實行集中。

第三、應當充分發揚黨內民主。

第四、黨中央堅持實行集體領導制。<sup>37</sup>

中共強調民主集中制的主要目的要樹立必要的領導權威，這點對江澤民體制具有特殊重要意義。江澤民是依靠鄧小平的保駕邁向權力中心，但江與鄧小平不同，沒有足夠的威望來建立強有力的領導權威。如此，影響到政策的順利推動乃勢所必然。爲了強化江澤民的領導權力，鄧小平曾提出「核心」的概念：

「任何一個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作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sup>38</sup>

鄧小平提出「核心」的概念，目的是鞏固江澤民的權力地位，也是要維持共黨的統治地位。但基於時代和環境的變動，中共也理解到，爲了樹立領導機構必要權威，領導機構本身的作法也扮演了關鍵性和角色。因此，中共學者也提出了下列三點基本的行爲規範：

第一、切忌朝令夕改，也就是要維持政策的一貫性。雖然由於實際情況的變動，有時必須作出政策的調整，但基本方向應始終如一。中共認爲朝令夕改的做法，最容易傷害到領導機關的權威；

第二、擔負不同責任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必須互相配合，不能互相拆台。

第三、領導者具有較強的個人素質，包括領導才能和個人品德。<sup>39</sup>

## 二、加強政治思想教育

如前所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供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共現行發展

<sup>37</sup> 同上，頁 353-355。

<sup>38</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09-310。引自李谷城，*認識中國：共產黨政治領袖*（香港：明報出版社，1997年1月），頁4。

<sup>39</sup> 馬慶泉，*中國改革的理論思考*，頁271。

階段中維持權力的合理化來源。但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結果，中共發現黨已面臨了「理想和信念」的問題。江澤民在紀念中共黨成立七十八周年的一項座談會上坦承：「有的同志對社會主義經過長期發展最終必然戰勝資本主義，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認識上產生了這樣那樣的動搖；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思想空虛、沈湎於花天酒地，或到封建迷信和其他消極行爲中去尋求精神寄托；有的私慾膨脹，在拜金主義面前隨波逐流，以至利用職權攫取國家資產，爲自己留所謂的後路。」<sup>40</sup>這樣的情況促使中共中央警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因爲，如同江澤民所說：「我們的陣地如果無產階級思想不去佔領，非無產階級思想就必然會去佔領。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和記取這種歷史的經驗教訓。」<sup>41</sup>

對中共而言，蘇聯的解體，就是一個足供借鏡的歷史經驗。因爲「蘇共從批判斯大林迅速發展到否定蘇聯七十年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在幹部和黨員中引起很大震動，造成歷史虛無主義和思想混亂，同時也對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產生了巨大沖擊波、」「一些不明真相的黨員、群眾思想混亂，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失去信心，而共產黨也因之失去凝聚力、戰鬥力。」<sup>42</sup>

爲了強化思想政治工作，中共在黨中央的部署下，已在縣級以上黨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中，展開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爲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其中，「講學習」被視爲這項教育工作的第一要務。因爲，中共認爲「學不學習、學得好壞，直接關係到用科學的理論、豐富的知識武裝全黨，關係到黨的肌體的生機與活力，關係到判斷形勢、駕馭全局、統領各項工作的能力，關係到各級黨政領導幹部執政意識的強弱和執政水平的高低，一句話，關係到我們黨能否成功地治黨、治國、治軍、能否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能否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長盛不衰，勇往直前。」<sup>43</sup>

中共要幹部「講學習」的主要內容是鄧小平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大旗，有助於江核心領導地位的穩固，並可持續中共現行的各項政策，讓反對者「無言以對」。此外，鑑於戈巴契夫推動「公開性」所產生的後遺症，中共當局對於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也採取相當限制的立場，減少民眾

40 人民日報，1999年7月1日，第2版。

41 同上。

42 張偉垣，蘇聯興亡和社會主義前景，頁384。

43 「論學習」（社論），求是雜誌，1999年第5期，頁9。



接觸外來訊息的機會。

### 三、推動政法工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中共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把做好政法工作，作為中共當前施政的重點。早在中共黨的「十五大」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即被視為一項治國方略，同時列入中共的「九五」計劃和二〇一〇年的遠景目標。中共認為這是繼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第三次的思想解放。

中共為什麼把推動政法工作作為當前施政的重點呢？根據我們對前述中共面臨內外挑戰的分析，其動機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首先，是為維持共黨領導權力的穩定。作為中共第三代的領導核心，江澤民今天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如何做好領導人的交班工作。江澤民曾經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sup>44</sup>

換言之，為了避免在接班過程當中，或是新領導人產生後，出現政局波動的現象，江澤民不得不強調以法治代替人治，為中共的領導政治，建立新的遊戲規則。中共常常評論蘇東劇變的一個內在因素，是沒有正確處理接班問題，也就是沒有做好接班人的選擇工作。但問題的關鍵可能不在接班人的選擇過程，因為中共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也缺乏一套解決繼承問題的辦法；真正發生問題的是新領導人當權後，立刻背棄傳統的觀念和行為模式，使政局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實際上，改革開放後的整體社會發展，已促使中共當局認清必須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上作出調整，才能應付新的變局。而依法治國則代表上述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即從當初的主要依靠政策，轉變到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再轉變到未來的主要依靠法律。從中共學者的觀點看，黨的政策和法律之間，存在著下列的區別：

第一、黨的政策是全黨意志的體現，表現在黨的文件上可以是公開

<sup>44</sup> 王家福，「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求是雜誌，1997年第24期，頁9。

的，也可以是「內部」的；而法律則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表現為由立法機關依照法定職權和程序制定的規則，它們必須公開，面向社會公布的；

第二、黨的政策主要由原則性的規定組成，不規定行為的具體規則；法律則是以規則為主，不能限於原則性規定，否則，權利和義務界限不明，難以對各種利益關係和社會關係加以有效調整；

第三、黨的政策主要靠宣傳教育和黨紀保證實施，但黨紀只適用於黨內；而法律則是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對任何違反者實施制裁，具有其普遍的適用性；

第四、黨的政策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大量的具體政策往往隨著形勢的變化而隨時調整，否則便不能發揮及時的指導作用；而法律則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法律一般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不變，以維護受法律調整的社會關係的穩定。<sup>45</sup>

其次，依法治國是為了解決領導幹部的貪污腐化問題。中共認為這是反腐鬥爭的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中共「中紀委二次全會」曾對黨政機關縣級以上領導幹部提出下列的要求：

第一、不准經商辦企業；不准從事有償的中介活動，不准利用職權為配偶、子女和親友經商辦企業提供任何優惠條件；

第二、不准在各類經濟實體中兼職（包括名譽職務）、個別經批准兼職的，不得領取任何報酬；不准到下屬單位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報銷應由個人支付的各種費用；

第三、不准買賣股票；

第四、不准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金和各種有價證券；不准接受下屬單位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贈送的信用卡，也不准把本單位用公款辦理的信用卡由個人使用；

第五、不准用公款獲取各種形式的俱樂部會員資格，也不准用公款參與高消費的娛樂活動。<sup>46</sup>

無論這些規定能否落實，對於那些參與經濟犯罪的黨政幹部而言，至少起了相當的嚇阻作用。

最後，依法治國是為經濟轉型提供一個法律保障。

中共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不僅推動大陸內部的經濟市場化，也加深了

45 張文顯，「依法治國與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學習鄧小平江澤民關於黨與法關係的論述」，求是雜誌，1998年第14期，頁26-27。

46 本刊評論員，「認真搞好領導幹部的廉潔自律」，求是雜誌，1993年第20期，頁2。

國際化的步伐。爲了便於經濟活動的順利進行，勢必建立新的去律配套措施，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

#### 四、調整對外關係

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爲經濟建設塑造一個有利的外在環境；同時，也要防止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在蘇東劇變後，鄧小平曾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爲」的方針。<sup>47</sup>我們認爲，上述鄧小平提出的方針，對於中共的對外政策，起了相當大的戰略指導作用。

鄧小平提出這些方針的背景，當然是受到蘇東情勢的影響。中共學者特別以戈巴契夫的外交「新思維」爲例，說明其中「有些主張和看法帶有很大成分的理想主義色彩，所以在實踐上是很難行得通的；有些不合客觀實際的一些錯誤的理論觀點，不僅無助於蘇聯國內經濟和政治改革，反而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利用，客觀上配合了西方國家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促進了東歐的劇變，加速了蘇聯的解體。」更明確地說：「蘇聯領導人只求與西方搞緩和、合作，只想盡快從西方那裏獲得經濟援助，結果使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於西方。」<sup>48</sup>

從中共的觀點看，戈巴契夫所犯的錯誤，是根源於他對國際形勢的認識不清，未能掌握其中的矛盾關係和階級衝突。因此，中共在擬定它的外交戰略時，特別重視對於國際形勢的正確評估。例如，中共國際問題專家指出：「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多極化的趨勢和個別國家企圖主宰世界事務的『單極』傾向之間的鬥爭日益突出，成爲當前國際中矛盾鬥爭的焦點。大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鬥爭和相互關係的調整，主要是圍繞這個矛盾展開的。」<sup>49</sup>所謂「多極化」趨勢，其具體表徵是中共的崛起和歐盟的進一步整合；而「單極」傾向則指美國憑借其冷戰後唯一超強的地位，意圖主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根據中共對於國際形勢的分析，我們發現江澤民爲中共當前外交工作提出的三項重點，基本上帶有濃厚的戰略意涵。江澤民認爲：第一、堅持睦鄰友好政策，積極發展同鄰國之間的關係，爭取一個良好的周邊環境；

47 引自陳啓懋，「中國在世界重新定位：全球多極化趨勢與大國關係調整」，中國評論，1998年10月號，頁15。

48 張偉垣，蘇聯興亡和社會主義前景，頁331-332。

49 陳啓懋，「中國在世界重新定位」，頁10-11。

第二、把發展和加強同第三世界即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作為外交工作的立足點；第三、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同大國的關係，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平等相待，互利合作。<sup>50</sup> 在上述三項工作重點中，發展對美關係是首要課題；睦鄰友好政策和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則是中共進行與美國「既聯合、又鬥爭」戰略的籌碼。

以美國今天的實力，妥善處理對美關係，當然攸關中共的主要外交利益。近年來，中共正致力於與美國發展一套「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共的目的與當初戈巴契夫提出外交「新思維」時的著眼點一樣，也是為了避免與美國衝突。中共學者強調與美國對抗會產生下列的結果：

第一、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合作中強化日美聯盟，以日本平衡中共在亞洲的大國作用；而中共則失去利用美日矛盾的可能；

第二、會造成美加強對「台獨」、「藏獨」等「中國分裂勢力」的支持，從而加劇中共維持「國家統一」的困難；

第三、會被其他國家用來增加他們在與中共解決矛盾時討價還價的籌碼。例如，在南沙問題上，美國的支持會提升那些與中共有利益衝突的國家的強硬立場，使矛盾更加複雜。<sup>51</sup>

避免與美國衝突不僅可以達成上述的消極性目標，積極的意義是吸引美國企業界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投資，以及緩和「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國內的效應擴大。當然，在重視穩定與發展中美關係的同時，中共強調不會因此放棄「反對霸權主義這個基本原則」。而睦鄰政策和發展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則成為中共建立反霸統一戰線的助力。其中，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最具成果。

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已從一九九二年的宣布視對方為「友好國家」，進展到一九九四年決定發展「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一九九六年四月，葉爾欽（Boris Eltsin）總統訪問北京時，雙方更宣布決心發展「平等信任的、面向廿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無論名詞有何不同，中俄雙方幾乎都同意，今天的兩國關係，是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促進兩國關係發展的因素很多，面對西方的共同戰略利益，是一個重要的考慮。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雖繼承了蘇聯在國際社會的角色，但國力

<sup>50</sup> 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年12月19日，第2版。

<sup>51</sup>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頁159-160。

已大不如前。俄羅斯不僅未能取得西方社會足夠的經濟援助，並且因為北約的東擴問題，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產生嚴重的磨擦。在俄羅斯，許多人甚至覺得西方意在保持俄羅斯的衰弱；因此，認為應加強俄國的國際地位，以中俄友誼來促使西方對俄羅斯的尊重，進一步採具體措施幫助俄國，一本暢銷的俄羅斯雜誌「首都」(The Capital)曾表示：「當美國人瞭解俄國可以靠自己生存，以及俄羅斯恢復與中國的密切關係時，美國才會變得慷慨些。」<sup>52</sup>

同樣地，當中共認為來自北方的威脅消除後，它可以利用俄羅斯，作為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一股力量。<sup>53</sup>中俄關係的強化，特別是軍事合作的層面，確實令華府感到憂心，擔心東西方的冷戰態勢，會因中俄的結盟而有借屍還魂的可能。

涉及睦鄰政策的部分，日本也是中共的一個重要目標。江澤民是第一個訪問日本的中共國家元首，雙方的關係將著重在經貿合作與安全課題兩個部分。中共瞭解日本和美國擁有「安保體制」的條約關係，日本是美國亞洲政策的重要支柱，因此對日關係的另一個考慮是避免美日安保體制的擴大，傷害到中共在周邊地區的利益。

至於第三世界國家，長期以來即是中共用來從事反霸鬥爭的主要後備力量。冷戰結束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邊際效用驟減，但中共口頭上仍不放棄對它們的重視和支持。因為有朝一日，這些國家在中共進行反美鬥爭時，還有可能給與中共必要的政治聲援。

## 伍、結 論

據說，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去年在一次內部工作會議中，曾向中共領導幹部推薦了一套由邢廣程所著題為「蘇聯高層決第七十年——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的書。這套書共分五冊，對於蘇聯由盛而衰的經過，作了相當詳盡的分析和描述。無論這項傳聞是否屬實，蘇東劇變，特別是蘇聯解體的歷史事件，確實帶給中共當局相當沈重的打擊。

本文研究結果顯示，中共以蘇東劇變為鑑的想法和作法，在歷史上有其脈絡可尋。因為，兩者之間實在存有發展上的許多共同點，其中包括：

<sup>52</sup> Quoted in Eugene Bazhanov, "Russian Policy Toward China," in Peter Shearman e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 166.

<sup>53</sup> *Ibid.*, p. 168.

第一、雙方都是以史大林主義模式作為建政的基礎，而改革的需求也都針對社會主義體制共有的弊病而發；第二、改革的理論大同小異，共黨的階段性任務也是大致相同，也都透過改革來獲取統治權力的合法性；第三、共黨在改革過程中面臨的挑戰類似，也都產生腐化的嚴重問題。

儘管如此，中共沒有因為改革而出現分崩離析的現象。其主要的原因是擔任改革開放政策「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為中共的改革過程建立了「穩定壓倒一切」的共識，其中包括政策的穩定和政局的穩定。在穩定的共識下，中共以發展經濟為優先，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堅實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步地從事上層建築的調整，包括共黨本身角色的自我調整，也就是中共眼中的自我完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中共的政治行為有其彈性靈活的地方，也有其堅持的一面。

觀察未來共黨角色的變化，除了本文所論及的中共能否順利推動其應變措施外，最重要的是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間的互動關係。中共強調這有賴於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從中共慣有的辨證思維來看，共黨能否持續維持其領導地位，也是寄希望於改革、發展和穩定的良性循環。

\* \* \*